

殷白评论集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慧光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185
殷白评论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重庆长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插页2 字数117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 700

ISBN7-5368-0772-5/I·148
定价：1.90元

为续征途觅新鞋

(代序)

张慧光

殷白同志是我的长辈，同时也是我的老师。还在五十年代之初，我就曾听过他的有关生活与创作问题的讲演。他的乡音很浓，使我听来倍觉亲切，因为我发现，我们都来自钱塘江潮涌涨潮落的一方。虽然如此，我们之间并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我真正接近和了解殷白，乃是最近这几年的事了。

殷白作为一名革命的文艺战士，从青年到老年，足足奋斗了半个世纪。由延安、晋绥而重庆，由抗日根据地而新中国，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文学建设的事业。其间他编过报纸，也编过刊物，早年参与田间主编之《诗建设》，抗大山脉文学社主编之《山脉诗歌》，胡乔木主编之《中国青年》，萧三主编之《大众文艺》；长时期担任《晋绥日报》副刊主编，全国解放后任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主编，《西南文艺》主编，等等。

殷白不止是一位老资格的编辑，同时又是一位涉猎广泛的作家。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但更具影响的是评论。文如其人，殷白为文大多朴实无华，不拘一格，旗帜鲜明而态度平和，常常寓灼见于尺幅之中。诚如周扬同志所称道，

他的评论“没有八股气”。殷白恪守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如庄稼与土地。他说：“生活终究是文学的老师。针砭时弊，批判社会，可以是文学对于社会的‘干预’；而陶冶性情，培养新人，文学却不能不向生活学习。”他鼓吹年轻一代作家追求今天和过去联系，使创新与传统相结合。他固然重视传统，但是决不守旧。恰恰相反，他竭力鼓励创新，在为李贵小说集所作序言中他就引用了作家所说的一句话来表达这一层意思，这就是，“用一架古琴，弹奏当代的歌。”事实上，既演革新，又师传统，乃是殷白对于文学的一贯主张。

文学创作是一种艰苦寂寞的劳作，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欢乐，有时痛苦，还可能因信念与现实错位而迷惘。殷白对此深有体验，但是照他看来，“一种希望的失落感，常常是另一种追求的催化剂”。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句激励士气的话语，更是对于创作甘苦的至深的理解。

我还以为，要是我们笼统地把殷白归之于一般评论家之列，似乎远没有把话说到点子上。因为殷白有殷白的道路与个性。他曾经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组织工作者（他自称打杂），一名勤恳的老编辑，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评论家，这三者他一身兼并，并且保持和谐的统一。尽管他离开原岗位有年，而他的心并没有离开，还始终牵挂着、关心着文学事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最早发现并通过周克芹长篇佳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原稿，又全力向读者推荐的是他；为吴若萍、贾万超、任宗景、王致远一批新老作者呐喊鼓劲的是他；为主群

生、李贵、胡其云、叶雨灝等人的处女作推敲得失并为之作序的是他。……他还是许许多多初学者的朋友和他们作品的第一个读者，近年来他一直为培育、扶持文学新人而默默耕耘。他的部分评论正是打这儿产生，因此也可说是他的编辑心得的结晶。

如果说殷白对年轻一代的成长倾注了满腔的心血，那么对于他的前辈与故人，则是以脚踏实地的工作表达了战友真诚的情怀。他先后为已故老诗人邓均吾、作家李南力整理旧稿，交涉出版，最终使《邓均吾诗词集》、《李南力选集》（与人合编）得以问世。这些事他都做得一心一意，满怀激情，实在令人感动。

作为一位老编辑，殷白具有热烈的心肠，丰富的经验。他虽无意谈论经验，却于无意中道出了几十年积累的心得，他曾说：一个优秀编辑的素质说到底是要有胆识。只有那些胆识过人的编者，才能做到沙里淘金，善于发现闪光的作品。作为后辈的一个同行，我深深体味到殷白这话的分量。

讲到这里便我想起一件事。1983年殷白重返延安，在宝塔山下即兴吟诗，有两句说：“归来讨新稿，还要去攀登。”无论过去与现在，他都这样攀登着；我相信，今后他还将这样兢兢地攀登，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集子编定之时，殷白同时嘱我代序，我虽乐意又自觉难于承担。以上拉拉杂杂的一席话，不过是我对这位长者为人为文的一点零碎的感想而已，还不知说准了没有。

1988年3月·重庆

• 3 •

目 次

题材选择作家	(1)
悲壮的力量	(19)
解放思想，发现生活	(27)
动乱岁月的青春之歌	(31)
评《月落乌啼霜满天》	(38)
叶雨濛作《老人湖》序	(47)
祖国之爱和儿女之爱	(51)
长歌如诉三代情	(55)
人世卑微 心灵高洁	(64)
做人的工作和写人的文学	(67)
一位老诗人的发现	(73)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旅程	(81)
生活多情	(86)
喜看《昨天，昨天的故事》	(89)
大山的气息	(93)
《李南力选集》序	(96)
胡其云作《花镇》序	(99)
为《母亲》节编本致少年读者	(101)
文艺“三性”略谈	(106)

我们要哪一种现实主义	(113)
文学的有所为和作家的有所不为(118)

文学书简

两个时代的“伤痕”	(121)
创作不能忘记(123)
《名作欣赏》通信(125)
原始不美(126)
《星光》赞语(127)
祝愿和希望(129)
给自学者(130)
答关于一篇评论的注释(132)
致谢伊丽(137)
推荐落叶组画(140)
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140)

旧作留存

试谈歌剧《白毛女》(142)
读柯仲平《从延安到北京》(145)
读黄声孝的快板(151)
读《红岩》(155)
故事与生活(168)
真实·普通人与英雄(172)

请承认讽刺小品文	(176)
后记	(179)
附录：老编辑殷白	庄月江(180)

题材选 择作家

——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当前受欢迎的有两类作品。一类是以勇闯禁区的题材和崭新主题，震动时代脉搏，扣响读者的心弦。另一类则以情节的曲折，创新出奇，富于戏剧性、娱乐性赢得群众的喜爱。前一类中有些作品难免说理多于形象的缺陷，后一类作品中，不无离开生活追求情节的偏向。

题材始终是重要的。创作要积极影响生活，帮助历史的前进，不能不有比较地（轻重缓急）选择题材。文学总是要讲点趣味，“寓教育于娱乐”（周恩来）。文学的教育意义总是与生活美感交织在一起。融战斗精神与生活气息于一体，受思想教育与美感享受于同时，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灵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

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仍然是我们要努力奋斗的目标。四川作者周克芹同志的新作，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似乎是当前“百花齐放”之中，透露出这种努力追求的一个信息。

小说以1975年冬天，在第一次农业会议的推动下，长期动乱的我们国家出现一线希望的短暂时期为背景，择取四川农村的一个切面，写几个女子和她们年老固执的父亲以及有关男女之间的生活故事。作者原计划写个中篇，一发而不可收拾，中篇结构演成了长篇。这是作者的笔不由己，是生活积累的触发，是创作酝酿的成熟，是文学诞生的规律。

作家不能无条件地自由选择题材。只有在你熟悉的生活领域里，才有选择的完全自由。是生活形成题材，不是“题材”去找“生活”。作家选择题材，题材也选择作家。当代长于写农村生活的赵树理、柳青等前辈作家，就是这样被选择出来的。这个规律，早已反映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之中。

这是一条真正广阔的道路。周克芹正在这条路上跨出他自己的步子。他的步子有什么特点呢？让我们拿他小说的人物来作点比方吧。

小说中，不幸、柔弱但是坚韧的四姑娘许秀云，对她固执的父亲许茂说过：“请你老人家看我娘名下，拨给我这间破屋，……我一辈子住在这儿，做些吃些。我能做，再苦再累都不怕。”

另一处，息厚的代理支部书记龙庆，抱着同情和不平，对“倒台”的原支部书记金东水说：“三年了，当时上级宣布你停职检查，至今也没有个发落！”老金回答说：“我一份检讨都

没有写，叫他们怎么发落呀！”

许四姑娘如此眷恋贫穷的家乡葫芦坝，金东水甘居草篷而不作违心的检讨，因为他们心中有爱、有理想。

五十年代的农村少年周克芹，也有这种气质。他曾有机会进了省会的农业专科学校，那时候并无规定“社来社去”，但是农村来的中专生却自愿回到了农村。他怀着乡土之爱，回到生身养育之地，在父老姐妹兄弟之中，当队长，当会计，当不吃公粮的“业余干部”，从青年到壮年，从农民到共产党员，从爱生活到爱文学。风风雨雨，“做些吃些”二十年。生活之路就是他的文学之路。

从这样的作者，我们可以期望听到农村的真实的故事。果然，他给过一些清新朴实的短篇，现在，又给了第一个精心孕育的长篇。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故事的进程只有半个月，而且只占其中的几个白天和夜晚，如此集中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活和爱情的故事，给我们介绍了至少有一打之数的各具个性的人物，涉及了一些严峻的可资探索的人生哲理，道出了当代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揣在人们心上的苦闷、怀疑、希望和悬念。

对于这样一部及时的饶人兴趣的长篇，人们或许会说，作者选对了题材，但我不妨倒过来说，这是题材选对了作者。

据作者自己说，小说中有关不少的文字，差不多是从作者前几年的日记本当中直接搬上来的。那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写这本小说。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周恩来同志论题材的这两句话，乃是创作真言。如果不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长期积愤于心，如果不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如果不粉碎“四人帮”和解放思想，要“偶然得之”谈何容易。

有同志说，题材好像是介乎生活和作品之间的半成品。这是一个有趣的探索。但无论如何，题材还是题材，半成品不是作品。从生活到题材不易，从题材到作品，尤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需要作者生活的、艺术的、思想的功力。

二

现实主义不仅是细节的真实，而且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典型就是艺术的真实，的确是比生活原型更高的真实。林彪、“四人帮”害怕真实，却大谈“更高”，只能是搞阴谋文艺的欺骗。丢掉真实性，侈谈“典型化”，也只能把文学引进唯心主义的死胡同。一度泛滥的所谓“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贫农诉苦，最后捉特务”的那一套公式，只能是对生活和创作的嘲笑。从文学的历史上看，这只是大江大流里的沉沙浮叶。五四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滚滚前进着，表现在新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典型。在农村人物的画廊里，从阿Q到李有才，从祥林嫂到李双双，从闰土到梁生宝……，一系列的典型人物，记下了我国人民觉醒、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却面临着历史进程中一个新的特殊的错综复杂的环境。解放后的中国农民，经历了清匪反霸、

土地改革运动，经历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合作化运动。生产高涨，精神焕发。这段历史以翻身感、幸福感的甜情蜜意，永远留在亿万农民的回忆和怀念之中。但从五十年代末开始，道路坎坷起来，几经折腾，直到出现“四人帮”作乱的恶性局面。

“人们像发疯似的，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对立起来，好像人可以不吃饭，空着肚子苦苦修炼之后，就可以进入‘天堂’。”这是身居农村的作者，直接对生活打上的问号。

与此同时，在北京，一位我党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我们敬爱的衷心怀念的张闻天同志），在处境困厄之中，以他马克思主义的犀利观察，对极左路线痛下针砭。他指出：“如果不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踏为画饼充饥的魔术。……除了给国家与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张闻天（洛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环境是灾难性的，人的情况怎样呢？小说通过许茂的九姑娘许琴，道出了这个年青的党支部书记的不得其解：“爹一天比一天更自私、更暴躁；三姐从前是那样热爱集体，现在越来越‘抵触’啦，对什么宣传都不相信；七姐呢，成天追求个人享受；四姐的幸福在哪儿？从前郑百如欺侮她，如今虽说脱离了那个火坑，可独个儿住在那孤零零的小破屋，沉默得像个影子似的……，葫芦坝的事情真叫人想不透……，还有呢，共青团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家心里，不知道在想些啥

啊！”

这样严峻的现实，如果说党都不了解，像颜少春那样比较成熟的基层老党员也不知情，那就不真实了。出身农村的当过县委部长的工作组长颜少春，凭着她对农民的熟悉，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信念，通过她给许茂送药片，许茂一定要给钱这个细节，她和许琴之间有一场谈话：

“农民同我们干部的关系，已经糟糕到这个地步了，……咋能怪他老人家呢？想想嘛，要是这些年来他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不愁。要是我们干部队伍没有出现那些白吃白喝，还要卡农民脖子的人，许茂大爷他不见得这样小家子气吧！不会的，这完全是生活教给他的……”

“是啊！”许琴激动地抢着说：“前年夏天来了一群干部，他们不抓生产，不抓群众生活，大家都断炊了，可他们还要叫学样板戏，有个女的说我爹那样子，演常富最合适，硬要拉他去。他装病了，到底没有去。可是他在家就骂开了，骂工作组的人，骂共产党，那时，我还和他吵过一架呢！”

“为什么呀？”

“因为他骂共产党。”

“唉！”颜少春又露出了一丝痛苦的笑容。

(引自小说最早发表的原作)

骂党是不好也不对，但许茂老汉不是坏人。作者用了这样泼辣的笔墨，正是刻画了这个灾难性的环境触目惊心的典型意义。

年青的许琴看不透葫芦坝的人和事，总觉得只有这地方怪，别的地方不会这个样子。老成的龙庆也对颜少春说：“你在葫芦坝住久一点，就有体会了；这个背时地方啥也不出产，就是出产谣言！”看来，这葫芦坝的一老一少都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特殊，“不典型”了。但是，有经验的读者都会承认，“这一个”小小的葫芦坝，特殊中间有一般，个性之中有共性。七十年代上期的中国农村，哪里没有金东水这样的好干部受打击，哪里没有郑百如这样的坏蛋飞扬跋扈呢。环境和人是辩证的统一，但归根结底，是人构成环境。历史是人创造的，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三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主要是许茂和四姑娘许秀云的故事。在许茂和许秀云的形象里，倾注了作者深沉的爱和同情，善意的鞭挞和光明的希望。

如果说许茂性格中的固执，触及了农民身上那一部份旧的习惯和成见，那么在许秀云身上，这份传统的固执已转换为对习惯势力的反抗，改变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四姑娘和父亲的性格冲突，是两个都有掌握自己命运的顽强意志的人的冲突，势均力敌而最后女儿强过父亲。“吵架的结果，十回有

十四是老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许秀云对生活、爱情、幸福这些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追求，符合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发展趋势，因而她是强大的。她的决心和毅力终于高出老汉，也高出她的众姐妹和同辈男女。尽管她遭遇不幸，但并未被不幸压倒；她是柔弱的，但勇敢坚韧。她向前看，向往未来，希望不绝如缕，生命之火不灭。她勤劳而富于心计，艰辛而藐视困难。她一往情深，爱自己，尤爱别人。爱得热烈，爱得深沉。她对金东水的爱情，对小长秀的母爱，是阶级的深情，是人世间配称伟大的那种献身之爱，它像茫茫冰原上的一股暖流，足以温暖一颗苦斗之中的战士的心。尽管作者笔下的金东水，正直有余，勇气不足（他毕竟是农村干部，不是那位乔光朴厂长），对她疏远得不近情理，对自己矜持到近乎虚假。因为生活并不证明他不需要她的爱，因而更显出她的爱情的坚强伟大。这种爱情对人生对社会的意义，只有真正懂得生活，知冷知暖的过来人，才能掂出它的重量。

这里我必须提到作者1963年发表的一个短篇《井台上》。写的是一个伏旱天的早晨，人们在井台上打水，谈论生产队的一个妇女刘秀英的去留问题。山区本来穷苦，又加旱灾当头，刘秀英的妈妈在背后怂恿她嫁到风调雨顺的平川大坝去。刘秀英却早已同本队的会计员相好。如果她真的要走，不仅是背弃爱情，也是对这个贫穷山区的人们一个精神上的打击。所以当刘秀英亲自来到井台上，说明她坚决不走，说她“从来没有同意过”她妈的意见时，人们的欣慰之情是异乎寻常

的。以至大家挑水之后，给队长老钟留下井底的一凼浑水，但在那位后到的队长眼里，那水是清澈透亮的，“喜悦简直要从心里溢出来了。”

这就是乡土之爱吧，也许是农民特有的感情吧，但是多么朴实敦厚，鲜明直率的感情呵！这个短篇使我们回忆起，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的日子里，不论在农村在城市人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心是靠在一起的。

但是七十年代初期，情景就不同了。小说通过许茂这个人物，提出了一个新的严峻的社会问题。老庄稼人许茂有他第四个女儿那种对生活的认真，却固执着他独有的偏见。对于他的固执，人们可以理解，可以同情，却不可以帮他的忙。而他的固执，也必然从外部从内部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烦恼，最终固执不下去。生活的辩证法正是这样发展的。这是比任何语言更有权威的说服力。

建国以来，我们从文艺作品里见过不少农村人物的“从落后到转变”，都是靠“忆苦思甜”。用旧社会的苦难，对比今天的幸福，纠正“忘本”思想，完成人物转变。但是这个“配方”对七十年代的许茂不灵了。这个六十开外走回头路的老庄稼人，愈是回忆过去，愈认为自己的行为无可指摘。他正是没有忘了庄稼人的“本”，蔑视人们把庄稼当儿戏，把集体的土地瞎胡弄，才精心作务他的自留地的。至于他在人们空喊“革命”，不管生产的“空隙里”，用正当的和不太正当的手段，拼命地积聚钱财，也直认不讳，他说：“你们认为我这几年真的穷了吗？没有呢，我积攒着，悄悄存起来，为的是